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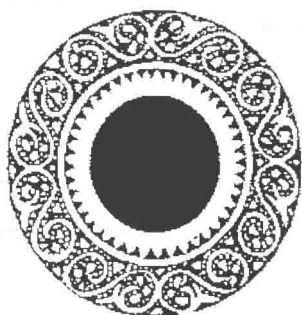


西北民族论丛

● 周伟洲 主编 ● 第八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论丛

● 周伟洲 主编 ● 第八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民族论丛. 第八辑 / 周伟洲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1636 - 4

I. ①西… II. ①周… III. ①民族历史—西北地区—文集
IV. ①K28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120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西北民族论丛》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办,每年出版一辑。《论丛》是以“西北民族”为研究对象,重点是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因此,西北民族研究,虽然仅是对西北地域的各个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但其包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且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尤为重大。

《论丛》面向国内外,广集有关西北民族研究的论文及民族调查报告、译文、书评等,以期广纳百川,尽量展示有关西北民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论丛》还将收录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面向国内外的“马长寿民族学讲座”论文,采用匿名审稿制度,以学术创新和水平作为择稿的主要标准,不囿于一家之言,提倡平等争鸣,以达到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推动西北民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的目的。

总之,《论丛》的宗旨是:繁荣学术、服务现实;形式多样,不断创新。我们期待国内外广大学者、读者关心和支持《论丛》,并不断惠赠佳作,共同将《论丛》办好,使之能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西部大开发的现实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所有支持《论丛》出版的单位和个人,没有他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论丛》是难以如期出版的。

周伟洲

2002年2月

《西北民族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伟洲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志勇	王 欣	尹伟先	厉 声
吕建福	余太山	杨圣敏	张 云
李大龙	李范文	李 琪	罗 丰
苗普生	周伟洲	高永久	樊明方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目 录

有关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大龙 (1)
掀起盖头	
——唐代吐蕃的真面目	林冠群 (27)
唐代边疆史地五题	
——唐代墓志札记五则	王义康 (81)
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	
——何家村出土玛瑙杯与中西文化交流	韩 香 (95)
试论清前期回疆的经济开发	周伟洲 (104)
试析国民政府的“康茶筹藏”政策	徐百永 萨仁娜 (117)
历史与传承	
——中亚陕西村回族穆斯林的文化认同	李 琪 (128)
中亚东干人跨国族群的形成及类型探析	王 超 (141)
近代宁夏教育发展趋势、特点与经验教训	王曙明 马志俊 (156)
新疆回族民族心理的社会调查	黄达远 马应征 (167)
荣赫鹏入侵西藏,1903—1905	阿拉斯代尔·兰姆著,梁俊艳译 (193)
约瑟夫·弗莱彻对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研究	
..... 弗朗西斯·奥宾著,哈宝玉译	(230)
《突厥语大词典》与波斯阿拉伯史料中有关麝	
与麝香的记载	杨东宇 (242)

附录：

- 第十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徐百永整理 (259)
- 第十一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徐百永整理 (263)
- 第十二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吴洪琳整理 (267)
- “边疆民族发展论坛：新疆、西藏专题讨论会”综述 ... 尹一帆整理 (275)

CONTENTS

Several Problem On the Borderland Theory of China	<i>Li Dalong</i> (1)
Uncover the Facts ofTubo (Tibet) in Tang Dynasty	<i>Lin Guanqun</i> (27)
Five Problem On the Borderland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i>Wang Yikang</i> (81)
The Agate Cup Unearthed fromHejiacun;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Han Xiang</i> (95)
On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Hui Jiang in the Early Qing	<i>Zhou WEIZHOU</i> (104)
“Selling Kham Tea to Tibet”: A Policy of National Government	<i>Xu Baiyong</i> (117)
History and Propagation; Cultural Identity of Hui Muslim in Shaanxi Village of Central Asia	<i>Li Qi</i> (128)
Dungan People in Central Asia: A Cross-Country Ethnic Group’s Formation and Type	<i>Wang Chao</i> (141)
Modern Educationin Ning Xia; Its Development Trend, Characteristics and Lesson	<i>Wang Shuming ,Ma Zhijun</i> (156)
Hui Ethnic Psychology in Xin Jiang: A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i>Huang Dayuan ,Ma Yingzheng</i> (167)
Younghusband Mission(1903—1905)	<i>A. Lame, Translated by Liang Junyan</i> (193)

- Musk and Musk Deer in *Divânu Luḡat al-Turk* ... Yang Dongyu (230)
- Joseph Fletcher's Study on Islam Religion of Northwest China* Francis Obin, Translate by Ha Baoyu (242)
- Research of the musk deer and muskin Compendium of Turkic Dialacts (*Divânu Luḡat al-Turk*) and Persian Arab historical data Yang Dongyu (259)

有关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大龙

有关中国疆域的研究，应该说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正史之一的《汉书》首设《地理志》，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自传说时代至西汉时期的形成和演变作了相对系统的阐述，可谓开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研究之先河。^①此后，历朝各代的正史都有《地理志》详述疆域变化，而唐代出现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出现的《太平寰宇记》以及元、明、清各朝的《一统志》更是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阐述专门化。虽然这些史书不能算是现代意义的疆域研究，但也为后世进行中国疆域研究奠定了牢固的资料基础。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对中国疆域的蚕食鲸吞，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学术界对中国疆域的研究日益得到高度重视，并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20~40年代，先后有葛绥成的《中国边疆沿革史》^②、顾颉刚和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③、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④、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⑤等著作出版，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中国疆域研究的代表著作。

① 以往学者多以《尚书·禹贡》为开端，如刘宏煊在《中国疆域史》中即认为：“中国疆域史的研究，如果从《禹贡》始，已历两千多年。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仅仅是史学的附庸。”参见氏者《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但《禹贡》所记载的非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似不能够称之为多民族国家疆域史的研究。

②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

③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

④ 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出版。

⑤ 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出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界对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探讨也一直没有中断,经历了从初期处理历史疆域原则问题的讨论到探索中国历史疆域构成及形成规律等理论问题。近些年来一些有关专著不断出版,如马大正、刘狄合著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过程》^①、刘弘煊的《中国疆域史》^②、林荣贵主编的《中国疆域史》^③、葛剑雄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④等,虽然这些著作多是属于在前人基础上对中国疆域形成过程分阶段所作的具体阐述或分析,但也为人们进行理论探讨奠定了学术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也自2004年始开辟了“疆域理论研究”栏目,从促进边疆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有计划地组织了一系列相关专题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疆域形成进行理论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关于中国疆域理论的探索还有很多原则性的界定尚需广泛讨论,有关探索也并没有完全展开,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制约研究继续深入的重要因素。

有感于此,笔者试图针对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从推动相关研究深入的视角略述拙见,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共同推动中国疆域理论的研究。

一 “中国疆域”的指称范围及其属性

“中国疆域”的指称范围,似乎是一个不应该有争论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论及中国疆域的形成,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疆域”的指称范围。关于“中国疆域”含义的界定,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需要明确将被探讨的“中国疆域”之“中国”是何时的“中国”,以及它与历史上“中国”的关系。二是需要对“中国”的属性作出明确界定,要明确它是“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汉族国家?对这两个

①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②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③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④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

问题的解答,应该是探讨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的前提。

·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般会认为所要探讨的“中国”自然是现实中的“中国”,而何为现实中的“中国”?从疆域的角度而言,一般会认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包括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近30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疆,也确实有很多学者持有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认识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简称“中国”的主权国家,清朝虽然没有简称“中国”,但是它是第一个以“中国”身份和邻国签订边界条约的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二是作为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中国疆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开始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界,由之中国疆域进入了形成时期,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结束了其形成过程。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经过了近代列强对清朝领土的“蚕食”与“鲸吞”之后形成的,而且在行政管辖上尚未实现全国统一,如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视为中国疆域研究的范围,即使是将未实现统一的区域(如台湾)包括在内,也不能够完全涵盖中国疆域历史发展所涉及的所有区域,更不能如实反映中国疆域自然形成的结果。基于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疆域”所涉及的范围应该是指1689年至1840年期间清朝的疆域,而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

虽然这里可以将1689年至1840年间清朝的疆域确定为“中国疆域”最终的形成时期,但不能由此而认为中国疆域只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因为这一时期清朝的疆域也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活动区域或政权疆域不断碰撞、重组,分裂和统一交替出现而最终凝聚到一起的,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白寿彝195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①一文引发了中国学界对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参与了讨论,结果是形成了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是主张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框架,去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研究视角,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②;另一类不同的观点则强调中国疆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其间

^① 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参见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而对每个阶段“中国疆域”的界定,依据只能是当时皇朝的统治区域。^①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的讨论继续展开,在上述两类观点的基础上又先后出现了以“各民族共同活动区域”、“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中原统一王朝疆域”等原则来界定历史上“中国疆域”的不同主张。^② 学界依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依然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探讨,但多是对以往观点的补充和完善。如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③ 即是如此,作者对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观点^④作了更加完整的论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内的所有民族以及历史上在此范围内存在的民族的活动区域及其所建立政权的疆域,都是历史上“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再如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⑤一文进一步完善了“1840年的中国”的主张,这一历史疆域内的各民族先民所建立的政权和中原政权一样,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学者继续论证传统观点,提出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必须承认其存在一个消长的变化过程的观点,进而认为占据中原地区的各个政权都是历史上的“中国”。^⑥ 由此看来,持续近六十年的争论,学界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应该说各种说法都有其证据,也不乏具有合理的因素,导致观点产生分歧的关键实际上是落在了对历史上谁代表“中国”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对于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于学术界而言,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汉族王朝和中原地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乃至“中国疆域”的形成,往往忽视了其他民族政权和边疆地区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地位,导致分歧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对历史上谁代表“中国”问题,并不仅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新出现的并至今困扰着学术界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历代史书作者乃至

① 参见半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几个问题》,《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参见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

④ 参见赵永春、王松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四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⑤ 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⑥ 田澍、杨军辉:《古代西北疆域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历史上在中华大地上活动的众多王朝、政权或民族的大问题。可以说导致历史上各政权或民族不断出现纷争乃至流血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这些王朝、政权或民族都想成为能够代表“中国”的“正统”。是历史上各王朝、政权或民族对“中国正统”的争夺导致了中华大地的政治分布格局在分裂、统一之间转换,尽管统一的规模在秦汉王朝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但争论一直也没有中断。主要表现是:尽管出现了所谓记录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似乎谁能够代表“中国”的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不过实现更大范围统一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正统”地位在入主中原近八十年后的雍正皇帝时期依然面临着来自国内的挑战。雍正皇帝时期关于“满洲”“正统地位”的争论即是一个重要表现。雍正年间,以曾静、吕留良等为代表的汉族儒士,为了反对满族所建立的清朝,以先秦时期的“夷夏观”为理论基础,从“华夏中心”出发,大肆宣传对清朝统治民族——满族(满洲)——的歧视思想。对此,雍正皇帝带头进行了驳斥,有关言论载于《大义觉迷录》之中。从该书卷一的记载看,雍正并没有否认“满洲”统治者的“夷狄”身份:“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但同时却认为所谓的“夷狄”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划分,不是“华夷”不同的标志:“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同时引上古的事例为满族成为“中国之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更进一步,雍正皇帝将这种观念和“中国疆域”的发展相联系,认为正是这种观念的负面影响阻碍了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玃,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雍正皇帝的这些言论,目的虽然是为清朝的“正统王朝”地位进行争辩,而且所举的例证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为人广泛用于“正统”的论争之中,并无新意,但争论本身却充分说明了关于谁能够代表“中国”或称为“正统王朝”即

便经过了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元时期两次由分裂到统一，到了已经实现“大一统”的清朝也依然是个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问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成为新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数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民族的规定都有这一原则的体现，但似乎并没有消弭学术界关于历史上谁能够代表“中国”或称为“正统王朝”的争论。持续近六十年之久的讨论即是明显的体现，而且这种争论也影响到了一般民众，且反映强烈。由CCTV《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之一的阎崇年签名售书时被打事件中可以看出其强烈程度。因此，笔者认为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在“中国”属性的认识上取得一致意见，尤其是历史上的“中国”的属性。

关于“中国”的属性，由于1949年10月以来官方长期进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宣传，尽管也存在着一一些分歧但构不成主流，而于国外学者而言，他们往往用自己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待中国的疆域，于是出现了“长城以北非中国”、“中国是汉族国家”等观点。对此，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方面去看待这些观点的形成，进而对其进行批驳。笔者并不否认有些国外学者提出这种观点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史上确实没有一个王朝以“中国”为国号，而且“中国”一词也是形成于汉族之中的历史事实，一味从政治角度来否定上述国外学者的观点似乎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2009年12月8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欧立德（Mark Elliott）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作题为《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有些认识耐人寻味，颇有启迪。他认为中国曾经“从历史中消失”，理由是：“我说的（中国）‘从历史中消失’，指的是缺乏一个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我们认为是单一的、统一的，包括我们所指的‘中国’这个政治体。”^①欧立德教授的这种认识应该是反映出一些西方学者将古代中国等同于历史上汉族建立的王朝，而不认为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甚至于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王朝都不属于“中国”的看法。不过他没有看到中国历史所反映的另外一种情况。虽然中国古代史上没有一个被称为“中国”的王朝，但谋求成为“中国正统”却是多数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王朝或政权的追求目标。中华大地上的

^① 欧立德演讲内容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演讲者审定，特此说明。下同。

众多王朝或政权一般习惯于用“天下”称呼王朝的疆域,虽然对于历史上哪个王朝或政权可以称之为“中国正统”存在较大分歧,但深藏在生活于这一疆域上的人们意识中的“天下”和现实中的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被分为“夷”、“夏”两部分是得到广泛认同的,而且不论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众多王朝,还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乃至实现局部统一的政权,基本都奉行或接纳了这一发端于中原地区的“中国正统”的观念,进而对“中国正统”的地位展开持续不断的争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很关注“中国”含义的探讨,也发表了许多论著,但多数学者强调“中国”一词在地域、民族或文化方面的含义,否认其政治含义。^①但笔者却认为,“中国”一词最初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或文化、民族概念,这些含义都是在“中国”一词形成之后所增加的附属含义,而“中国”一词从开始出现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政治概念。“中国”用于指称“京师”,自然可以将其归入地理概念之中,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没有注意到“京师”为什么可以被称为“中国”?很显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京师”是“王”的所在地,也就是说是先秦时期“天下”权力核心的所在地,因此“中国”指称的不仅仅是“京师”这个地域,也隐含着代表“王权”的含义。“中国”代表王权所在地的这一含义最终促成了:“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占有“中国”即可以成为号令四夷的“正统王朝”的观念。这种观念形成之后即对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王朝或政

① 多数学者不认同“中国”一词具有国家政权的含义,而是认为其是属于一个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如翁独健认为:“中国一词,从《诗经》上就可以找到,不过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种褒称。”(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张璇如认为“关于‘中国’的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把它认为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岛之说,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疆域,是不对的。”(张璇如:《民族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我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陈连开认为在西周时期出现的“中国”有多种含义:其一“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以与四方诸侯相对举”;其二“周灭商以前,以丰镐为中心的周人区域为‘区夏’,即‘夏区’,克殷以后,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称‘中国’或‘土中’(即中土),是指夏代中心地区;又以商代的中心地区为‘东夏’。于是‘中国’包括丰镐、雒邑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即后世称为中原的地区。以此地域与远方各族对称,则与商代以‘大邑商’与各‘方’相对而称的含义相通”;其三“指夏、商、周三族融为一体的民族,以夏为族称,也包括夏人的文化。”(费孝通主编:《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等等。

权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用于指称近现代意义国家的概念多数情况下是含糊的“天下”而非“中国”，而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中国”却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称号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众多的民族或政权，各民族或政权之间的关系既有激烈的流血冲突，也有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往，但一条贯串始终的主线却是这些民族或政权对“中国”的争夺。甚至可以说，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不仅是汉族（华夏）内部各种势力努力奋斗的最高目标，也成为了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众多草原民族政权南下中原建立政权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正是各民族或政权对“中国正统”的持续争夺，导致了“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固定区域“政治体”的名称，且指称范围不断扩大，但最终在清代，人们意识中和现实中为皇帝所有的“天下”和“中国”实现了重合。由之，清朝虽然没有以“中国”作为国号，但开始以“中国”的身份立足于世界舞台，“中国疆域”由此最终形成。^①

至于“中国疆域”在清代最终得以形成的原因，从上述雍正皇帝的批驳中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一是清以前汉族及其所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习惯于将“不向化者”“斥之为夷狄”不利于各民族的和睦，所以即便是“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夷夏”的划分影响了对边疆的积极经略乃至阻碍了中原和边疆融为一体的进程；二是“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单纯从清朝的角度看，是观念的变化和对边疆的积极经略最终促成了“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当然，“中国疆域”的形成原因是非常复杂，而且也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非有清一代之功，观念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在清代以前中华大地上没有形成过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谓“历史上的中国”的提法于中国疆域研究而言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因为不同时期谁能够代表“中国”是一个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问

^① “天下”是一个难以明确具体范围的词汇，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涵盖范围，但它是中国古人经常用于表示“中国正统”的皇帝理想中管辖范围的词汇，其含义和“中国”的指称范围在清代才实现重合。相关的阐述可以参阅拙文《“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